

1942：思想建党聚伟力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自我革命中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 王 文

冬去春来，中国人民在浴血抗战中迎来了1942年。这时全面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5年，虽然形势依然严峻，但是随着抗日力量不断增长，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已经处在胜利的前夜。

延安的3月，春寒料峭。毛泽东在给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满怀信心地写道：“现在已经冰解河开，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开始。”他预言：“要在今后两三年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利的光明已经在望，这个日子已经不远！”

（一）

继上年中共中央在延安高层领导中开展整风学习和充分准备，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大规模开展。

在抗战紧要关头开展全党整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深谋远虑的战略之举。全面抗战以来，日军不断加紧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使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害。国民党顽固派两次发动反共攻势，加緊封锁边区，使根据地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进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从党自身情况看，一方面，党内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残余还严重束缚着广大党员的思想。另一方面，抗战以来党的队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全国仅有党员4万人左右。短短几年之后，到1942年初，全国已有党员80万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达50万人。但是，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党员队伍大部分是抗日救亡高潮时投身革命的，新党员、新干部在全党占90%。他们大多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还缺乏深入理解，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亟待提高。

指导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伟大社会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党内外形势任务的变化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开展整风运动，使全党接受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启蒙，从而推动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使党成为领导抗日战争和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核心。毛泽东对整风寄予了厚望，他希望通过整风，“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这段话深入透彻地阐明了整风的重大意义。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剖析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对它们的表现作了具体分析，阐明了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把文风提到了党风的高度，使人耳目一新。

毛泽东这两个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整风时期，由少数高级干部的学习发展到延安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的学习。

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整风学习。延安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毛泽东作整风报告（油画）

在整风过程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那时候，在前方没有好的学习条件。毛泽东提倡，抓紧在延安这个和平环境学习。各地选出来的七大代表，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时间，同志之间无处不谈整风学习，无处不谈思想改造，会上会下，饭后到延河散步，星期天访亲看友，大家都在相互切磋、砥砺奋进。有的干部说：原来一直觉得自己又进步又革命，同旧世界早就决裂了。其实，旧思想、旧意识还很深，小资产阶级王国在主宰一切。立场、感情、思想同工农兵格格不入，通过这次整风学习，才使自己从孤悬万丈的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真正在精神领域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

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自我革命的创举。通过整风，全党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统一了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自此形成，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二）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的文艺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他们满怀革命和救国热情，但对如何掌握革命文化的武器为抗战和人民大众服务，如何与工农兵结合正确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不是很清楚。在文艺界内部，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争论、分歧，也造成了宗派主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义和不团结的现象。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问题十分重视。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接触了许多文艺界人士，同萧军、艾青、刘白羽、丁玲等进行了深入交谈，真诚坦率交换意见。还召集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等党员作家召开座谈会，深入细致了解情况。经过认真调查和充分准备，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有100多人参会。这次会议共召开了三次大会。在5月2日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

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毛泽东还结合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讲述了知识分子接触工农、转变感情的过程，给与会者留下全新感受和难忘印象。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月16日，毛泽东出席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

5月23日，毛泽东出席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会议结论中，他进一步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的问题。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毛泽东作总结讲话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会场从室内搬到礼堂外的露天场地。在西北高原广阔的天宇下，煤气灯的光芒格外耀眼，大家认真聆听，思想豁然开朗，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到了有力推进作用。延安文艺界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创造出《白毛女》《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优秀作品。

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入党”的观点：“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这段话的意义已经不限于文艺界整风，对指导全党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特别是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都有重要意义。

（三）

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中共中央在1942年下大力气实行了精兵简政。

实行精兵简政是民主人士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的提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自从党中央提出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因为认识不够，执行的力度不够大，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7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精兵简政问题，如果想不到敌后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不想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敌后变化会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动地定出办法。摆在全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渡过敌后的困难。他还提出了精简的比例是：在全部脱离

生产的人员中，军队占百分之七十，党、政、民、学占百分之三十；全部脱产人员占老百姓人数的百分之三。要按这个比例，主动地、彻底地、有计划地执行。

9月7日，毛泽东专门给《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深刻指出：“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为此，毛泽东借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另一个是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此后，中共中央又陆续多次作出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和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迅速行动起来，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通过精兵简政，有效克服了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达到了毛泽东要求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四）

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疯狂。敌华北方面军下达了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规定继续“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

根据敌人的动向，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2月11日至25日，连续发出反“扫荡”作战的指示。华北敌后军民遵照上述指示，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2月3日，日军以12万余人的兵力“扫荡”太行区，以7000余人的兵力“扫荡”太岳区，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领导机关。八路军主力乘隙转入外线，1个月作战39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5月，敌发动第二次进攻，以25万余人“扫荡”太行北部，7000余人“扫荡”太岳南部地区。经过38天作战，八路军又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

在反“扫荡”中，中共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总部曾遭日军合围，经奋力战斗，终于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于5月25日在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名将殉国，全党为之悲痛。朱德总司令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在晋西北，八路军粉碎了敌人集中900余兵力的“扫荡”。5月14日，日军1个大队600余人及伪军100余人奔袭驻兴县的晋西北党政军领导机关。晋西北军区抓住该敌孤军深入之机，在其受创后仓皇撤退之时，集中主力一部，于19日将敌围歼于兴县、岗县、临县交界处的田家会，共歼敌500余人。

在冀中根据地，5万日伪军进行了空前野蛮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造成“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在定县北疃村的地道里，日军用毒气毒死抗日军民800多人。冀中区军民开展了极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企图。在5月、6月两个月中，毙伤日伪军1万余人。与此同时，冀东、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也展开反“扫荡”作战。

在对敌斗争中，抗日军民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创造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许多新的斗争形式。后来为人们家喻户晓的“敌后武工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八路军创造性地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组织由军分区或旅统一领导的，由军队的连排干部、优秀战士及地方党政干部、翻译人员（有的地区还有日人反战团体成员）组成的武工队，深入敌后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对敌斗争。太行、太岳和冀南3个地区，至8月底止，共抽调约1400人，组成了42支武工队。其中太行地区的武工队，按照“不大打，不硬打，积小胜为大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仅在4月10日至18日的9天中，共进行战斗45次，毙伤日伪军310名，俘虏50名，摧垮伪组织“维持会”300余个，镇压死心术敌的汉奸400余名，隐蔽地开辟和恢复了有5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组织武工队，对挫败日伪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粉碎其“扫荡”“蚕食”、封锁，恢复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

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在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新的挑战。4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要求全党做好准备。由于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加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采取了缓和态度，国共关系暂时趋于好转。

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发生了积极变化。1942年1月，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即《联合国宣言》。宣言规定：签字国全力与轴心国作战，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苏联红军与德军展开了殊死交战。经过3个月的血腥战斗，10月9日，苏联红军突破了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工业区德军包围线，战场态势发生根本逆转。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社论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11月7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他在文章中预言：“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1942年，身在延安的艾青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感受到光明即将到来，他兴奋地创作了著名诗歌《黎明的通知》，热切地呼唤迎接美好新世界的到来，向人们传达了中华大地即将破晓的信息：

……
诗人啊，你起来吧
而且请你告诉他们
说他们所等待的已经要来
说我已踏着露水而来
已借着最后一颗星的照引而来
我从东方来
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
我将带光明给世界
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

从创建共产党到成立新中国

